

日本近代市场经济建立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的萌芽

严清华

重商主义是经济学说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近代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最初的一种理论体现。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类似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阶段。作为萌芽形态的重商主义思想,日本大约在江户时代即已出现,江户时代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江户时代的思想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思想也紧密相联,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化中的许多思想大都可以从江户时代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原型。日本经济思想中的重商主义思想即是如此。

重农思想支配下的重商观点

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仍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自然经济,故重农思想仍普遍存在,并在思想领域中占居着支配的地位,当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重农思想,这方面的言论在许多思想家的议论中都可见到。如江户初著名儒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即说:“古之明王,重农而抑工商,贵五谷而贱金玉,行俭约而禁华美。以重本抑末之道,为治国之政也。”^①江户前期的著名思想家、古文辞派创始人荻生徂徕(1666—1728)也说:“重本抑末,此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②这些议论,与中国古代传统的重本抑末说教别无二致,是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对日本发生影响的结果。

但在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由于当时幕府和大名等统治者要将农民所缴纳的年贡米及其它年贡物资的剩余部分拿到市场出售,同时也需要通过市场购买其它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因而对市场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由于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名、武士和众多的工商居民们各方面的生活需要也必须依靠市场来得到满足。因而,形成了多方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增强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反映到思想领域中,就是出现了商业和商人持肯定态度的观点。

肯定商业和商人的观点,首先表现在一部分思想家对当时商业和商人客观作用的积极描述上。这种描述,不仅反映在一部分较为激进的思想家的言论中,而且也反映在一部分较为突出地坚持农本观念的思想家的言论中。如荻生徂徕的学生、著名思想家太宰春台(1680—1747)即在强调“民之业有本末,农为本,工商为末业”^③的同时,描述了当时商人和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今之世,有米谷布帛而乏金银,难立于世。不唯小民之贱者,即令士大夫以上至诸侯国君亦皆然。然今之世,有禄之士大夫与国君皆如商贾。因倚金银而足万事之用,故以如何获取金银为计。此已成为今日之急务矣。”^④荻生徂徕也说:“开辟以来,仅此百年之间,无钱不成之世也。”^⑤另一思想家本多利明(1744—1821)也说:“天下通用金银尽握于商贾之手,豪富之名仅在商贾,永禄长者,武家皆贫穷,故商贾之势日盛而居四民之上。”^⑥宽政年间(1790—1800)活跃于世的经论家蒲生君平(1768—1813)更以“大阪豪商一发怒,天下诸侯直颤抖”^⑦的词语,不无赞许地描绘了当时商人强大的势力与重大的作用。类似的议论或描述,在当时思想家的著作中俯首即是,举不胜举。

当时的思想家除积极描述商业和商人的客观作用外,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贝原益轩和荻生徂徕在坚持农本思想的同时,即提出了四民并存、相互为助的观点。益轩

说：“士勤于奉公，农勤于耕役，工勤于精心制器物，造物之人不欺；商勤于交易而无伪，不谋暴利。四民共存，不强贪利而福祿自来”。^⑧ 徂徕说：“天地自然，四民有之。农耕田以养世人，工作器以供世人，商通有无以助世人，士治天下以使无乱。各司其职，相互为助。”^⑨ 另一思想家三井高房（1684—1748）也有同论，他说：“天下四民，士农工商，各任其职，子孙继业，以成其家。”^⑩ 思想家本居宣长（1730—1801）也说：“为交易计，决不可无商人。”^⑪ 总之，肯定工商的议论，在江户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可谓比比皆是。但上述思想家关于工商业的议论，总的说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江户时期比较系统地阐述过重商观点的，要算石田梅岩、海保青陵和佐藤信渊了。

商人代表者石田梅岩的重商思想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江户中期代表商人利益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心学”以工商业者为对象，以通俗化的形式阐述商业和营利的合理性、正当性，肯定商业和商人的积极作用，被称为“庶民之学”。梅岩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商思想，其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商业的地位与作用。他对商业有个简明的解释：“凡 蓄货曰商。”^⑫ 他认为正是由于商业的存在，人们方可“以其有余，易其不足，互通有无”。^⑬ 商业的基本作用就在于“通用天下之财宝”。他认为商业的这种作用是不可能为其他职业所代替的，他说：“何云商人之道，谓士农工之道有所不能替者也。”故在他看来，商人对当时社会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若商人皆为农工，则无通财宝者，万民皆有难。”他认为商业与商人的存在不仅具有通过商品交换而调剂社会需求的机能，而且还可以通过实现“商卖之利”与“商卖之德”而协调商业与商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亦即可以“安万民之心”，“助天下之治”。因而在他看来，商业与商人的存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主张商与士农工平等。在他看来，商业与商人的作用既然十分重要，那么对之就绝对不可予以轻视。他认为，商与士农工一样均为“天下百姓”，相对于君主而言，都处于“臣”的地位，区别只在各自所司职分不同而已，“士，既位之臣；农，草莽之臣；商工，市井之臣。”“士农工商，其职虽异，然却通于一理。”^⑭ 他引用孟子之言以为论据，指出：“孟子言道者一，士农工商亦天之一物，天焉有二道哉！”他诘问贱商论者道：“何以嫌贱商人？”

三、肯定“商卖之利”。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必会获得商业盈利。在梅岩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如同工匠作工获得工钱，农民种地获得收成，武士供职获得俸禄一样。“给工匠以作料，工之禄。给农民以田垄，是亦同于土之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何以立哉？商人之买利，亦天下准允之俸禄。”“商人之买利，如同武士之俸禄。无买利，如同武士无俸禄。”他认为，商人通过商业经营活动而获得的这种“买利”或“卖利”，并不违背儒教之道，“得卖利，商人之道。若未闻以本金买卖而称为道，以为欲卖利而无道，何以明孔子以子贡为弟子哉？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之于买卖之中。子贡无买卖之利，何富之有！”因而，在他看来，从伦理道德上讲，商卖之利也应予以肯定。

四、强调讲求“商人之道”。鉴于社会上尚有“奸曲商贾”^⑮ 的存在，梅岩极力强调讲求“商人之道”。他指出：“不知道者，贪而亡家”。作为商人，不知商人之道是危险的。梅岩的所谓“商人之道”，日本学者土屋乔雄认为指的是梅岩所理解的正确的商业经营理念，^⑯ 颇有道理。从梅岩的议论来看，它主要指的是商人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而其中最为强调的则是商人的正直之心。他说商人首先“所应具有者，乃正直。”^⑰ “商人以直取利而立，以直取利乃商人之正直，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他认为“真正之商人，应有人也立，我也立之念”，亦即不可有害人之心。当时有句流行古谚，叫做“商人与屏风，直则不立。”意谓屏风必须折叠才能放稳，商人只有奸曲方可获利。梅岩对这句古谚大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命题：“屏风与商人，直则立，歪则不立。”意谓屏风歪着放是站不稳的，商人不正直也不能立足于商业世界。他强调商人应“知商人之道”，指出：“知商人之道，则离欲心，以仁心相勉，以合道为荣”。总之，商人应十分讲究商人应有的职业道德。

五、论及“商人之心”。梅岩在《都鄙问答》卷二中有一段议论，专就“某学者讥商人之学”的诘难进行辩驳，在别的地方他也多次谈到“商人之心”的问题。他认为，为了使商人尽商人之职，守商人之道，

必须依靠学问的力量,使商人知道自己应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他指出:“无学问之力,则有所不知”,“商人一入学问即可知其然。”^⑩在商业社会中也确实有“不正商人”的存在,如何使这种商人戒除自己的不良恶习呢?他的回答是:“能戒此者,唯学问之力也。”即认为只有依靠学问的力量才能驱恶从善,净化商业社会的道德风尚。

总之,梅岩站在商人的立场上,为商业经营者大唱赞歌。他这方面的言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日本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近代化的展开也起过积极的作用。

富藩论者海保青陵的重商思想

海保青陵(1755—1817)为江户后期的著名思想家。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他被视为日本近代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⑪依据日本经济思想史著名学者逆井孝仁先生等人的观点,他是日本型重商主义中藩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⑫

他的重商思想是从“富国”即富藩的目的出发的。他的父亲多年致力于官津藩的财政改革,颇有成效,青陵深受影响。他自己有考察诸藩的经历,并曾就加贺藩的财政经济改革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与方案。因而他的许多议论大都是针对藩问题而发的,他在议论中所说的“富国”即指的是富藩。他说“云富国为第一急务,乃孔、孟、管仲之所同。后人以为富国乃儒者所不云,可叹矣。”^⑬江户时代,儒教仍是日本的国教,尊崇儒者乃一般的社会思潮。故青陵在此借助于儒者的权威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不过他所着重强调的是“富国”,即富藩。而所谓富藩,在他思想上的侧重点,指的并不是藩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是藩统治者诸侯或大名财政收入的增加。就是说,他所说的“富国”尚不是广义的概念,还只是狭义的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富国在吸取他国之金”,^⑭即认为要富藩就必须通过吸取他藩的货币以增加本藩的财政收入。如何吸取他藩的货币呢?他的主张是诸侯或大名亲自经营商业以获取商业盈利。所以他心目中的富藩,既指增加藩的财政收入,又指藩主亲自从事经营活动致富。他的重商思想正是从这一目的或前提出发的。他的重商思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主张诸侯商人化,强调交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论证商业的合理性。他针对当时大名卖米即出售农民所缴纳以供自己食用后剩余的年贡米一事,说道:“卖米乃商卖。大国大名皆商卖之人矣。……不买卖则一日也不能生活。非贱金银之世,非笑商卖之时。”^⑮“使商人经商,非国之耻事也。必须卖米之武家,买物卖物,亦非丑行矣。”^⑯

二、主张改变小商小贩经营贸易的状况,实行藩专卖。他主张将民间货物收集至藩之手,然后卖往他藩,改变以往完全由小商小贩经营的状况,以降低成本,获取商业盈利。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藩可获利,而且民也乐意。同时在从生产者手里收集货物时还可增收一定的手续费。他认为这是一种“润下炎上”的好办法。所谓“润下炎上”,类似于《管子》所说的“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⑰“润下”指雨水从天而降,喻指百姓感受到获得了上面给予的好处,类似于《管子》所说的“见予之形”;“炎上”指雨水经过蒸发又升到了天上,喻指百姓不知不觉而被上面所剥夺了,类似于《管子》所说的“不见夺之理”。《管子》一书,早在江户时代以前即已传入日本,是古代日本士大夫都必须阅读的中国典籍之一。仅从前面所引青陵所述“云富国为第一急务,乃孔、孟、管仲之所同”一语即可看出,他对《管子》一书是较为熟悉的,因而他的“润下炎上”之说,是与《管子》一书的影响分不开的。

三、论证商业利润的合理性。和梅岩一样,青陵对商业利润也持肯定态度。有所不同的是,梅岩将之与武士的俸禄相比拟,认为它符合分配规律;青陵则将之与自然界的物物相生现象相对照,认为它符合自然法则。他的论点是:“田、山、海、金、米,凡在天地间者皆物品也。物品又生物品,理也。田而产米,与金而生息无异。山产林木,海产鱼盐,金、米生利息,天地之理也。”他的这一论点主要是就利息问题而言的,侧重点在于论证诸侯、武士剥削收入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诸侯、武士所拥有的领地、采邑就是其取得收入的资本,他们出租领地、采邑而获取年贡收入,有如放债取息,出售商品以获得更多的货币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凡云入,皆卖之事也。”“田之年贡,山之年贡,海之年贡,皆息物也,贷物品而取息也。是利息必取也。”这些议论,是立足于取息合理,获取利润符合自然法则这一观点而展开的,因而包

含有肯定商业利润的内容。

四、把商品经济观念运用于政治生活之中。中国先秦思想家韩非在阐述自利论观点时，曾有“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②6}的君臣互市之说。无独有偶，青陵在论证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时，也提出了一个与韩非之说极为相似的说法。青陵的议论是：“自古君臣者，市道之谓也。君以领地而使臣，臣卖智力而获禄。君买臣，臣卖于君，买卖也。买卖，善也，非恶也。……天子乃使用天下物品之豪家也，诸侯乃使用一国物品之豪家也，均为将各自之物品贷之于民而食其利息之人也。卿大夫士乃卖其智力于君，而以其贷金生活之人也。”这段议论，完全是对韩非之说的具体阐释。青陵从小接受儒教熏陶，熟读中国典籍，思想倾向于韩非的“法术”观点。故正如日本著名哲学家永田广志和日本经济思想史学家谷冈弘所断言，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所接受的是“韩非的影响”。^{②7}

富国论者佐藤信渊的重商思想

佐藤信渊（1769—1850）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德川时代经济学者中最著名的一位”。^{②8}和梅岩、青陵等人一样，他也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商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他既不是从商人的立场提出问题的，也不是从富藩的角度发表议论的，而是从富国的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的。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内容。

一、论证通商交易的必要性，充分肯定通商交易的积极作用。他认为通商交易是发展国家经济的最大事业，是国家实施政教措施的根本前提。他说：“凡兴国家之大利者，无大于通商交易。故斯业不兴，永久慈爱、笃守信义之政教不得而行。”^{②9}他还将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就通商交易问题，对比英国分析了日本的情况。他认为日本在地理、物产方面优越于英国和其他各国，“气候温暖，物产丰饶。其繁华富盛，世界中无与伦比。”英国地处日本之北，“气候寒冷，其物产不及我日本”。但英国为何经济发达，势力强大，称雄世界呢？他的看法是：“只以其能航行大洋，通商万国故也。是知海舶交易乃国家之要务。”^{③0}他认为日本是洋中大岛，在航海通商方面，处于世界上最有利的地位，故他主张日本大力发展航海事业，以收国际贸易之利。他说：“今以我日本洋中之大岛，若兴航海通商之业，其便利实为世界第一之上国。今欲兴其业，必先坚其舶，于海上风波及盗寇无所恐。且明天文、地理、测量之学，精其器物，严其武备，使在万里大海航行，犹如轻车熟路。先遣使至清朝及安南、暹罗等国，厚其礼，丰其聘，以结和亲，而后输送日本及暹夷国之物，考其他诸国之物品轻重以交通有无，以收互市之利。”^{③1}这段议论，不仅论证了日本开展航海贸易事业的必要性，而且具体设计了日本从事航海贸易事业的方法与步骤，同时也可以说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论证了通商交易的必要性，肯定了通商交易的积极作用。

二、认为商人掌握流通大权为害甚大，反对商人自由流通。他认为放任商人自由流通会导致兼并现象的发生，致使贫民流亡，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说：“使商人握货物买卖之柄，其害最大。……下贱之民富，则吞并贫乏百姓之产业，使贫者愈贫，终为流民，离散乡里。”^{③2}故他对放任商人自由流通持坚决反对态度。

三、主张国家经营商业，直接控制流通。信渊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经营商业的主张与方案。他的这一主张与方案，在日本学者中，有的称之为“商品的国家占卖法”，^{③3}有的称之为“彻底的商业统治论”。^{③4}澳大利亚学者铁沙·莫利斯—铃木（by Tessa Morris—suzuki）在其所著《日本的经济思想》中，将他的主张与方案称之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构想”。^{③5}这一主张与方案的基本内容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事务由国家统一管理。具体而言，在商业流通方面，即由国家设立名为“融通府”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他说：“融通府统辖世界之货物，抚御天下之商民以融会财用。将多处之物品运往少处，贱处之物品运往贵处，使有无相通，轻重相交。虽南北东西之偏鄙，无万货屈伸之差，群品高卑之异。使各地所出之物产，常平准其价。且又通商外邦，收互市交易之利润以充国实。使万民滋息蕃衍，上下丰乐，此其职也。”“且此府之要务，在专收交易之利润使财用富裕，以周济国内之穷乏。”^{③6}从这些议论来看，融通府的任务与职责是非常明确的，它既管理国内流通事业，又管理国际贸易活动；既管理商品的转运出售，又管理商民的买卖交换业务。它的基本目标是平抑物价，调节货物，获取利

润，周济贫乏，发展经济。其具体管理办法是，在各地主要关口及都会大邑设置称之为“平准馆”的官署，由该官署的官员率领和指挥商民开展交易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种适应自身发展要求的理论为其指导。和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推进一样，它在其最初也必然经历一个不可缺少的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阶段。重商主义即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初所进行的一种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从前述内容来看，日本在建立近代市场经济之初所进行的这种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是比较充分或充足的。日本近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那么发达，与其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较为充分或充足恐怕是大有关系的。

注释：

- ①《益轩全集》卷三《君子训》。参竹中靖一：《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米聂巴（音译）书房1972年版，第307页。
- ②《徂徕集》卷一《政谈》。《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280页。
- ③《经济录》卷五《食货》。泷本诚一编：《日本经济丛书》卷六，日本经济丛书刊行会1914年版，第107页。
- ④《经济录拾遗》。《日本思想大系》（37），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47页。
- ⑤《日本经济丛书》卷三，第554页。参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下），日本评论社1966年版，第27页。
- ⑥参本庄荣治郎，同上书，第142页。
- ⑦参山崎益吉：《日本经济思想史》，高文堂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 ⑧《益轩全集·家道训》。国书刊行会1973年版。
- ⑨《徂徕先生答问书》（上）。岛田虔次编：《获生徂徕全集》第1卷，米斯兹（音译）书房1973年版，第430页。
- ⑩《町人考见录·序》。《日本思想大系》（59），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176页。
- ⑪《本居宣长全集》，第578页。参本庄荣治郎，同前书（下），第72页。
- ⑫《都鄙问答》卷二。柴田实编：《石田梅岩全集》上卷，石门心学会1956年版。以下凡引《都鄙问答》，不另注。
- ⑬⑭⑮参本庄荣治郎，同前书（上），第70、72—73页。
- ⑯《俭约齐家论》。同前全集上卷，第23页。
- ⑰《山鹿语类》卷六《民政下》，国书刊行会版，第259页。
- ⑱土屋乔雄：《日本经营理念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64年，第220页。
- ⑲《齐家论》（下）。同前全集上卷，第217页。
- ⑳《石田先生语录》卷二十二。同前全集下卷，第283页。
- ㉑参藏井省白：《海保青陵经济思想研究》，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第106页。
- ㉒参经济学史学会编：《日本的经济思想》，东洋经济新报社1984年版，逆井文《明治以前的经济思想》，杉原四郎，《日本的经济思想家们》，日本经济评论社1990年版，《关于逆井的业绩》等。
- ㉓《稽古谈》。《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书店1970年版。以下凡引《稽古谈》，不另注。
- ㉔《管子·国蓄》。
- 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 ㉖参冢谷晃弘：《近代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雄山阁1980年版，第19页。
- ㉗⑳参泷本诚一：《日本经济思想史》，日本评论社1929年版，第255、256页。
- ㉘㉙㉚参野村兼太郎：《概观日本经济思想史》，庆应出版社1939年版，第317、322、311—312页。
- ㉛《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第822页。参本庄荣治郎，同前书（上），第111—112页。
- ㉜参藤井隆至译：《日本的经济思想》，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57页。
- ㉝参佐藤信渊：《垂统秘录》。《日本思想大系》（45），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501、501—502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